

明清小品丛刊

〔明〕江盈科 著

雪涛小说  
(外四种)

黄仁生 校注

上海古

版社

明清小品丛刊

[明] 江盈科

著

(外四种)

雪涛小说



黄仁生 校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 C I P ) 数据

雪涛小说: 外四种 / (明) 江盈科著; 黄仁生校注 .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5

(明清小品丛刊)

ISBN 7-5325-2645-3

I. 雪 ... II. ①江 ... ②黄 ... III. 小品文 - 作品集 -  
中国 - 明代 IV. I264.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18376 号

明清小品丛刊

雪涛小说(外四种)

[明]江盈科 著

黄仁生 校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上海书店 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委党校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9.25 插页 4 字数 198,000

2000 年 5 月第 1 版 200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7-5325-2645-3

I·1342 定价: 13.20 元

## 出版说明

中国古典散文，自先秦发源，中经汉魏六朝、唐宋，发展到明清，已经进入了其终结期。这一时期，尤其是晚明阶段，伴随着时代社会的发展，文坛也出现了新的变化。这一时期的散文园地，虽然没有再出现过像先秦诸子、唐宋八家那样的天才巨子，但也是作者众多、名家辈出；虽然没有再出现过《庄子》、《韩非子》一类以思理见胜的议论文，《左传》、《史记》一类以叙述见长的史传文，以及韩柳欧苏散文一类文质兼胜的作品，但也有新的开拓和发展，散文的题材更加丰富，形式更加自由，从对政治、历史和社会现实的关注，更多地转向对人生处世、生活情趣的关注，从而形成了又一个以文体为特征命名的发展时期，这就是文学史上习称的明清小品文。

小品的名称并不自明清始。“小品”一词，来自佛学，本指佛经的节本。《世说新语·文学》：“殷中军(浩)读小品，下二百签，皆是精微。”刘孝标注云：“释氏《辨空》，经有详者焉，有略者焉；详者为大品，略者为小品。”可见，“小品”本来是就“大品”相对而言，是篇幅上的区分，而不是题材或体裁的区分。小品一词，后来运用到文学领域，同样也没有严格的明确的定

义,凡是短篇杂记一类文章,均可称之为小品。题材的包容和体裁的自由,可以说是小品文的主要特点。准确地说,“小品”是一种“文类”,可以包括许多具体的文体。事实上,在明人的小品文集中,许多文体,如尺牍、游记、日记、序跋,乃至骈文、辞赋、小说等几乎所有的文体,都可以成为“小品”。明人王思任的《谑庵文饭小品》,就包括了几乎所有的散文、韵文的文体。尽管如此,从阅读和研究的习惯来说,小品文还是有比较宽泛的界定,通常所称的小品文,主要还是就文体而言,指篇幅短小、文辞简约、情趣盎然、韵味隽永的散文作品。

小品文作为一种文体的兴盛,在明清时期,主要在晚明阶段。而小品文的渊源,则仍可追溯到先秦时期。《论语》、《孟子》、《庄子》等书中一些精采的短章片断,可以看作是后世小品文的滥觞。六朝文人的一些书信、笔记之类,如《世说新语》中所记的人物言行,“简约玄淡,真致不穷”(胡应麟《少室山房类稿·读〈世说新语〉》),更是绝佳的小品之作。唐代小品文又有长足发展。柳宗元的“永州八记”,堪称山水小品中的精品。晚唐时期,陆龟蒙、皮日休、罗隐等人的小品文,刺时讽世,尖锐深刻,在衰世的文坛上独树一帜,“正是一塌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鲁迅《小品文的危机》)。宋代文化得到空前的发展,出现了不少百科全书式的文化巨人,而其中代表宋代文化最高成就的苏轼,就是一位小品文的巨匠。苏轼自由不羁的性格,多方面的文化素养,使小品文这种文体在他手中运用自如,创作出大量清新俊逸之作,书画题跋这一体裁更是达到了极致。以致明人把他推为小品文的正宗,编有《苏长公小品》。宋代兴起的大量笔记,不少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也为小品文的兴盛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把小品文作为一种文体加以定名,并有大量作家以主要精力创作小品文,从而使小品文创作趋于繁荣,还得到晚明阶段。这一阶段,不仅有不少作家把自己的著作径以“小品”命名,如朱国祯的《涌幢小品》、陈继儒的《晚香堂小品》、王思任的《谑庵文饭小品》等;还出现了不少以“小品”为名的选本,如王纳谏编《苏长公小品》、华淑编《闲情小品》、陈天定编《古今小品》、陆云龙编《皇明十六家小品》等。而作为小品文达到鼎盛阶段标志的,还得推当时出现的许多具有很高文学成就的小品文作家,如以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袁”和江盈科为代表的“公安派”作家,钟惺、谭元春为代表的“竟陵派”作家,以及同时或稍后的屠隆、汤显祖、张大复、陈继儒、李日华、吴从先、刘侗、张岱等,均有小品文著述传世。晚明小品文的主要特点在于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在艺术上极富创造性。晚明小品虽然在思想内涵和历史深度方面,无法与先秦两汉散文、唐宋散文等相比;但在反映时代思潮、探寻人生真谛方面,同样达到了时代的高度。

晚明小品文的兴盛,是与当时的社会现实、社会风尚和思潮的影响分不开的。晚明个性解放的思潮、市民意识的增强,是晚明小品文兴盛的重要原因。明亡之后,天翻地覆的巨变使社会思潮产生了新的变化,晚明的社会思潮和文学风尚得到了新的审视;同时,随着清王朝专制统治的加强和正统文学思潮的冲击,小品文的创作也趋于衰微。但仍有一部分作家仍然继承了晚明文学的传统,创作出既有晚明文学精神又具时代特色的小品文,如李渔的《闲情偶寄》、张潮的《幽梦影》、余怀的《板桥杂记》、冒襄的《影梅庵忆语》、沈复的《浮生六记》等,或以其潇洒的情趣,或以其真挚的情怀,为后人所激赏。

明清小品文不仅是中国古典散文终结期时的遗响,而且也是古典散文向现代散文转换中的重要一环,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不少散文作家都喜爱晚明小品,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一书中甚至认为晚明文学运动与“五四”新文学运动有些相似之处。20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文坛上,更曾掀起过一阵晚明小品的热潮。以林语堂为代表的作家大力提倡小品与幽默,强调自我,主张闲适,甚至认为“中国现代文学唯一之成功,小品文之成功也”(林语堂《人间世》发刊词)。在当时内忧外患的形势下,林语堂等人的观点无疑是不合时宜的,因而理所当然地受到了鲁迅先生的批评。但鲁迅先生对小品文本身以及晚明文学的代表袁宏道等并不持否定态度,而是认为“小品文大约在将来也可以存在于文坛,只是以‘闲适’为主,却稍不够”(《一思而得》)。鲁迅先生是把战斗的小品比作“匕首”与“投枪”,他晚年以主要精力创作杂文,正是重视小品文作用的表现。进入九十年代以后,随着思想的解放和物质生活的改善,文坛上又出现了一阵小品随笔热,明清小品的价值在尘封半个世纪之后重又为人们所发现,并开始得到实事求是的评估。为了使广大读者对明清小品有比较全面的认识,给广大读者提供较好的阅读文本,我们特出版了这套《明清小品丛刊》。

本丛刊精选明清具有较大影响和具有较高欣赏价值的小品文集。入选本丛刊者,系历史上曾单独成集者,不收今人选本。入选的小品文集一般根据通行本加以校勘,所据版本均在前言中予以注明。一般不出校记,重要异文则在注中注明。由于明清小品文作者多率性而作,又多引用前人诗文及典故,所论又多切合当时社会风尚,为给读者阅读提供参考和

帮助,特对入选的小品文予以简注,对文中出现的人名、地名、典故、术语加以简明的注释,语词一般不注。明清小品文集的校注工作是一项尝试,疏误之处当在所不免,殷切地期待着读者的批评与指正。

上海古籍出版社



## 前 言

自“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明代公安派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已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尤其是公安派的文学主张和小品文创作颇受重视,并曾对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产生过积极影响。但人们往往都以三袁兄弟作为公安派的领袖和代表作家来审视,而对曾为公安派的创立和发展立下过汗马功劳的江盈科却知之甚少,直到笔者辑校的《江盈科集》于1997年4月由岳麓书社出版以来,这种状况才开始转变。

江盈科(1553~1605),字进之,号涑萝。嘉靖三十二年二月出生于桃源县沅江边上距桃花源不远的的一个农民家庭<sup>①</sup>,与公安三袁同属湖广人,都是在楚风的熏陶下长大的。但他一生数奇,早年数困场屋,直到万历二十年四十岁时,才与比他小十五岁的袁宏道(1568~1610)同榜进士及第;而比他小七岁的袁宗道(1560~1600)却早在六年前就以会试第一、殿试二甲第一,选庶吉士,入翰林院授编修,位居清华之职;唯有比他小十七岁的袁中道(1570~1632)后来坎坷过之,迟至万历四十四年才中进士。

江盈科入仕前,曾与同里友人结社于桃花源,“名已隆隆

起”。万历二十年八月奉命赴苏州任长洲县令,他又开始与当地或过往的一些著名文人如王百谷、张凤翼、张献翼、屠隆、谢肇淛等交游唱和,初步形成了一种吴楚文风交融互补的氛围。由于吴中地区赋税极重,仅长洲一县,国税近五十万,当“滇南一藩省”,江盈科上任不久,就以征税不能完额而受到“夺俸”的处分,于是用世之心日冷,归隐之志渐生,但因家无田产,难以维持生计,只好“强自排遣,托于吏隐”。而袁宏道似乎早有先见之明,及第后尚未授官,就与兄长宗道上书告假回公安,在家砥砺“美剑”,待时而出。

当时文坛虽然仍为拟古云雾所笼罩,但后七子领袖李攀龙早在隆庆四年就已陨落,王世贞也于万历十八年逝世;于是复古派阵营内部开始发生分化,或出而修正末流弊端,或试图改弦易辙,而徐渭、李贽、汤显祖等人则已开始明确批判复古派的模拟之风。袁宏道兄弟此前曾结社于公安城南,自万历十八年至二十一年间三度访晤李贽并得读其《焚书》以后,也开始对复古派的模拟文风深致嫉恶,但尚无宗派意识。直到万历二十三年春袁宏道赴苏州任吴县县令,才与同年进士长洲县令江盈科在诗酒唱和的同时,开始讨论“商证”文学革新的主张。是年秋,袁中道(时为诸生)和陶望龄先后来吴。江盈科始与二人结交,公安派于是在吴中文化的沃土上开始形成。二十四年初,中道南游,至三月始归公安。随后宏道为中道刻诗集,并作《叙小修诗》序文,正式发表他曾同江盈科“商证”过的“性灵说”,公安一派鼎故革新之旗帜,实由此文而树立。大约与此同时或稍后,江盈科也作《白苏斋册子引》一文,提出“元神活泼说”<sup>②</sup>,与宏道所主“性灵说”相呼应。是年三月至明年正月,宏道因不能忍受吴令的剧务和官场的约束,而

连上七牍求去。年底清理文稿，先刻旧作《敝篋集》，又将仕吴以来诗文编为《锦帆集》付梓，江盈科为之作《敝篋集叙》和《锦帆集序》。前者阐发中郎性灵说的内涵，又有所补充，与《叙小修诗》、《白苏斋册子引》一起，可称为公安派“性灵说”的三篇代表作。

二十五年至二十六年，江盈科仍然镇守苏州，实际上是作为公安派创始人的代表，继续在吴中地区领导文学革新潮流。袁宏道辞官后并未回公安，而是在东南一带游览名山胜水，达一年有余，几乎每至一地，无不赋诗作文，广交朋友，并以诗书相寄的方式和江盈科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其间所作《解脱集》由江盈科刊刻，并为之作《解脱集序》和《解脱集序二》。至此，中郎早期的三种著作，都是盈科作序，共有四篇。二十六年二月，中郎由扬州出发，进京候补，与宗道相聚；四月，任顺天府教授。七月，中道也从仪征护送宏道家眷抵京，即入国学肄业。是冬又有黄辉自蜀入京，与三袁兄弟聚首甚密。中郎重申在吴文学主张，袁宗道、黄辉诗受到中郎的影响。是年大计后，江盈科在吴中、真州一带待选。九月传来消息，由于刑部尚书萧大亨和户部尚书杨俊民的推荐，吏部拟迁江盈科为吏部主事，但几天后因言官李应策劾奏他“征赋不及格”，而被改任为大理寺正。他当时作《闻报改官》二首寄给袁宏道，其中有“六年苦海长洲令，五日浮沔吏部郎”等语，颇为感伤。宏道立即写信给他，为北京“诗坛酒社添一素心友”而大快，劝其“闻报便当北发”，因为在朝宰官中有不少人“中时诗之毒”已久，“当与兄并力唤醒”。于是，又在仕与隐的矛盾中徘徊了很久的江盈科，终于在中郎的劝慰和激励下调整好心态，于万历二十七年正月从仪征出发，先向西行送家眷回桃源，然后北

上。

二十七年至二十八年,公安派成员或趣味相近者云集北京,结葡萄社于崇国寺,论学赋诗,文事颇盛。一时社友,除进之与三袁兄弟外,著名者尚有黄辉、丘坦、谢肇淛、潘士藻、刘日升、吴用先、李腾芳、苏惟霖、王辂、钟起凤等。二十七年三月,中郎升国子监助教。进之也于此后不久抵京,在大理寺正(正六品)任上仍以吏隐心态处之。此间,除参加葡萄社的活动和作诗以外,江盈科还写了一组政论文和数十篇寓言小品或议论小品,对现实政治和社会问题进行了思考;另外还上《法祖》、《宦寺》、《中兴》三疏,批评朝政,谏罢矿使税使。二十八年三月,宏道升礼部仪制司主事(正六品)。四月,宗道升右庶子(正五品)。江盈科《雪涛阁集》十四卷也于是时编成付梓,袁宏道为之作《雪涛阁集序》,再次申明反模拟剿袭主张,并对江盈科给予高度评价:“余与进之游吴以来,每会必以诗文相励,务矫当代蹈袭之风。进之才高识远,信腕信口,皆成律度,其言今人之所不能言与其所不敢言者。”以致推为“一代才人”和“大家”。江集袁序的问世,实际已带有袁、江二公对北京“中时诗之毒”者“并力唤醒”的意义,如果再加上公安派其他成员的活动成果,那么,我们可以说,公安派在吴中地区创立以后,经东南向北方的拓展,至此已经获得了初步的成功。随后不久,在京的公安派成员骤减。七月,袁宏道差往河南;八月宏道和中道离京南下回公安;九月,袁宗道卒于京。十月,潘士藻卒。而江盈科也于是年冬奉命赴滇、黔恤刑。

概括地说,自万历二十三年至二十八年,是公安派登坛树帜、鼎故革新、最富于生机的时期。袁宏道作为公安派主将的地位是无庸置疑的;而作为配角的江盈科,在辅助袁宏道开宗

立派过程中所起的积极作用,是公安派成员中其他任何人都不可替代、不可比拟的。如果我们把公安派副将的称号授予江盈科,他是可以当之无愧的。

此后十年,公安派进入调整发展时期,其活动中心曾一度向南方(包括西南)转移。二十九年春夏,袁宏道建柳浪馆于公安城南,并以兄歿哀痛得病为由而上《告病疏》,随后隐居达五年多。他的思想也已有所收敛,不再讲“性灵”同“闻见知识”的对立,论诗转而推崇杜甫、陶潜,求雅求淡,甚至对于自己以往诗文中“信腕直寄”之病,深致悔意,开始用心为诗文。而江盈科赴云南、贵州审讞冤狱期间,仍在继续阐发公安派的文学主张和从事著述活动。三十年秋还朝后,升户部员外郎(从五品)。三十二年七月,擢四川提学副使(正四品)。他的《皇明十六种小传》写成于云南,另有《雪涛谈丛》、《谈言》、《闻纪》、《雪涛诗评》、《闺秀诗评》、《谐史》等,也当作于云贵旅舍和回京以后。万历三十三年秋,江盈科卒于四川官所,袁宏道作《哭江进之》诗十首并序,袁中道作《江进之传》,对江盈科的为人和文学创作给予了高度评价。

在江盈科逝世后的第二年七月,袁宏道出山入京,补礼部主事。随后四年公安派的活动中心都在北京,但袁宏道已自悔其早期诗作浅易,诗风转趋深厚蕴藉。三十五年十二月,改吏部主事;三十七年春,升吏部员外郎(从五品);三十八年,升吏部郎中(正五品),是年九月卒。在他一生的最后几年,官运居然通达起来,这表明袁宏道隐居数年之后,也对不羁性格作了修正。

显而易见,公安派在这十年间的战斗色彩和拓展精神已不如上述开宗立派的八年,这固然与政治斗争的冲击和作家

心态的调整有关,但也同如下因素相联系:1.拟古剽窃之风已经有所扭转;2.公安派的理论及其创作已经传播较广;3.公安派的理论与创作也存在弊端,有矫枉之过,因而自身先做一些调整,不失为一种明智的举动;4.社会上已开始对公安派的弊端颇有微词,如钟惺在《与王稚恭兄弟》一信中就对以“袁、江二公”为首的公安派“矫枉之流弊”进行了措辞激烈的批评。当公安派的活动中心向南方转移之后,江盈科实际独当一面,先至西南(云南、贵州)开拓领地,再回北京坚守阵营,最后赴四川至死不辍。他的《雪涛诗评》,是公安派著述中少见的诗论专著,其主调仍然是反对拟古剽窃,提倡抒写性情,强调个人独创,可见其晚年思想并无大的转变。

综上所述,在公安派开宗立派和调整发展时期,江盈科实际上是作为这个革新派的副将而与主将袁宏道齐名。他的功绩与影响,仅次于袁宏道,而在公安派其他成员之上<sup>③</sup>。袁宗道虽曾发表过批评复古派的言论,但没有像宏道、盈科那样阐发标举过“性灵说”——那是公安派的理论核心,并且在公安派创立前期一直远离活动中心;直到宏道由东南北上,公安派活动中心也随之向北京转移以后,宗道才真正开始发挥作用,不幸仅过两年半就夭逝了;因此,若从文学流派的角度来看“三袁”并称,宗道实是叨了弟弟宏道的光。至于袁中道则因科考不利,在江盈科生前甚至于死后一段时间内,其政治地位和文学影响都不能与之相比;他之成为名家和公安派领袖,主要是在袁宏道去世以后(即公安派后期),其突出贡献是力主以矫弊来救衰,使公安宗风得以延续至天启年间。

江盈科与袁宏道一样,在以“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务矫当代蹈袭之风”的文学革新运动中,既有大功,也有弊端,因而

其生前死后也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不过，所有的争议或批评，几乎都集中于他的诗歌，而对他的散文则颇多赞美之词。如袁宏道在《雪涛阁集序》中说：“论者或曰：‘进之文超逸爽朗，言切而旨远，其为一代才人无疑。诗穷新极变，物无遁情，然中或有一二近平、近俚、近俳，何也？’余曰：‘此进之矫枉之作，以为不如是，不足以矫浮泛之弊，而阔时人之目故也。’”江盈科逝世后，宏道作《哭江进之》诗十首，其九曰：“作者心良苦，悠悠世岂知？近俳缘矫激，取态任斜欹。江阔无澄浪，林深有赘枝。向人言似梦，无计解愚痴。”袁中道也在《江进之传》中称其“诗多信心为之，或伤率意，至其佳处，清新绝伦。文尤圆妙”。凡是通读过《江盈科集》的同好，都会感到这些评价颇中肯綮。

江盈科现存的散文作品大致可分为传统散文和小品文两类，前者以《雪涛阁集》卷六所收“古论”和卷八所收“序文”为代表<sup>①</sup>，后者以《雪涛阁集》卷十二、十三所收“尺牍”和本书所收《雪涛小说》、《谈丛》、《谈言》、《闻纪》、《谐史》为代表。过去人们谈论公安派的散文，往往以袁宏道描摹山水的小品文为代表，它们之中的确有不少可称为“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精品，但也有人由此认定公安派不关心国计民生，“作品缺乏深厚的社会意义”，“思想贫弱”。而江盈科则正好与袁宏道互补，他不仅写了一系列忧国忧民、批评时政的作品，而且写得“超逸爽朗，言切而旨远”，同样抒发了作者的“性灵”。例如，《蜂丈人》和《催科》都是就征税这一有关国计民生的大事，分别从皇帝和县令的角度进行探讨，而《鼠技虎名》则对所有“挟鼠技”而“冒虎名”的文臣武将进行了批判，《天怒》甚至从江中小舟喻天下大舟，明确表示：“余盖忧焉，恐向者处丰城之小舟

而完，今处天下之大舟而覆。”似乎已预感到危机四伏的大明王朝距覆灭的日子不远了，以致不能不发出沉重的感叹：“今日之势，何可不亟图也？”

此外，江盈科的小品文还善于运用寓言和笑话，表现出传奇性、讽谕性、幽默性色彩，所谓“穷新极变”、“不拘格套”，在这里也得到了充分的表现。

江盈科“生平最喜听奇谈”，性好谑，也善谑，并且认为“谑亦有一段自然出于天性者”，“要之矢口而出，令人解颐，亦是一段别才，非可袭取”（《善谑》）。这种天性不仅直接影响到他的创作，而且时刻协调着他的吏隐心态。他和袁宏道一样都不堪忍受官场的俗套冗务，但他没有像袁宏道那样时而辞官，时而补官，而是坚持亦官亦隐，以吏为隐。原因在于其诙谐幽默的性格，使他既能揶揄世态人情，也可自我解嘲，从而协调其仕与隐的矛盾以求得心理的平衡。本书所收五种著作基本上都是他在北京任职时写成，潘之恒在《雪涛小说序》中认为“君之生平尽瘁尽力敦厚道者，备具于此”，“苟欲慕江君之为人，师其用心之微，请从事于斯说可矣”。又在《四小书序》中称“斯亦人人喜为诵读者”，并进而指出：“进之之谈说，猥拾鄙俗咳唾余沥，安于卑论浅见，村竖皆为解颐，而士君子或微哂焉。然进之所尚，未易窥也。彼其扶摇九万，托始于蕪末；震动六种，隐伏于毫端。进之具出世资，而姑为玩世之言，如方朔诙谐乎金马门，坡仙放浪于西湖泉石之间，众人固且易而骇之矣。子舆氏有言：‘言近而旨远者，善言也。’”

关于江盈科的著作及其版本问题，笔者在辑校《江盈科集》时，曾撰《江盈科生平著述考》一文做了详细介绍，但因当时限于条件，没有找到江盈科原本《雪涛阁四小书》和潘之恒



《亘史钞》本《雪涛小书》，只好以章衣萍于1935年整理的《雪涛小书》（收入中央书店出版的《国学珍本文库》第一集中）为依据，并提出了一些问题存疑。后来方知台湾中央图书馆和浙江省图书馆藏有万历四十年刻本《亘史钞》，原来存疑的一些问题基本上可以据此解决，恰好上海古籍出版社拟出一套《明清小品丛刊》，并已将江盈科小品列入，使我能将新发现的材料及时奉献给读者，唯一遗憾的是江盈科原本《雪涛阁四小书》至今仍未寻觅到它的踪影。

按照《明清小品丛刊》的编辑体例，本书只选历史上曾经单独成集者合为一帙。现就入选作品的内容、版本及校注情况略述如下：

一、关于《雪涛小说》，作于万历二十七年至二十八年春，最早见于万历二十八年（1600）刻本《雪涛阁集》卷十四，题名《小说》，计有五十二篇。大多写他任长洲知县或求仕时期的所见所闻所感，短的仅百余字，长的也不过千余字，可分为寓言小品和议论小品两类，其思想艺术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万历三十八年（1610），潘之恒曾将《雪涛阁集》卷十四的这五十二篇作品抽出来，分为二卷，以《雪涛小说》为书名单独刊行，其单行本今未见。万历四十年（1612），他又将单行本《雪涛小说》二卷收入《亘史钞》中一并刊行，卷首有潘之恒于万历三十八年所作《雪涛小说序》，部分篇章附有他的评语等，并在下卷补入了他受江盈科影响而作的《尽慧》和《假手》两篇小品，同时他还对有些作品的标题和正文作了修改或删除节。此外，还有一个仅收十四篇作品的《雪涛小说》版本系统，最早见于明末刻本《雪涛谐史》第一种，这些作品全是从《雪涛阁集》卷十四中选出，但对部分篇章做了修改或删除节；清初《说郭续》